

# 中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民间体育活动

——以吐蕃为例

耿 彬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西北民族大学讲师,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中晚唐五代时期,敦煌有大量的吐蕃移民融入当时的社会生活。本文通过敦煌文书、壁画的记载,考察了当时敦煌地区吐蕃与汉族文化交流形式,揭示中晚唐五代时期汉藏文化之融通。

关键词:敦煌;吐蕃;民间体育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2)03-0087-04

吐蕃是7~9世纪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一个王国。赤松德赞统治时,吐蕃国力达到了鼎盛。随着吐蕃势力的不断向外扩张,781年吐蕃占领河西的凉、甘、肃、瓜、沙、伊六州。当时敦煌隶属瓜州。吐蕃对敦煌的统治从781年一直延续到848年,之后进入归义军统治时期。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有大量的吐蕃僧侣、官吏、驻军和吐蕃百姓移民。张议潮收复河西之后,吐蕃移民仍大量存在,成为归义军管辖下的编户。敦煌卷子中存有大量魏晋至五代时期的写本典籍,其内容涉及隋唐五代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魏晋至五代时期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sup>[1] 247-248</sup>。

## 一、中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吐蕃居民

吐蕃统治敦煌前,河西已出现吐蕃势力。英藏敦煌文献S5697《申河西诸州蕃、浑、唃末等事状》记载“河西诸州,蕃、浑、唃末、羌、龙狡杂,极难调伏。”<sup>[2] 80</sup>蕃,即吐蕃。吐蕃统治时期,设置了瓜州节度使、沙州节儿、乞利本、都督、监军、部落使等职官,改变唐朝的乡、里制,将沙州百姓编成若干部落,利用敦煌汉族大姓进行间接统治。此时,吐蕃居民的主要来源:一、行政官吏及随行家属,如尚乞心儿、论悉诺罗、论莽罗等吐蕃官员先后出任瓜州节度使。二、驻军及随行家属。三、蕃僧。如大蕃国都统三藏法师法成在永康寺从事译经事业,敦煌文书中还记载了吐蕃占领敦煌之后不断派遣僧人、僧官对佛教教团进行管理的情况。四、安置在各个部落中的吐蕃移民,如行人部落中的乞结夕、遁论磨、判罗悉鸡,丝锦部落的苏南、触腊、屈罗悉鸡、摩志猎、尚热磨等。由此可见,敦煌存在大量的吐蕃移民,不仅有行政官吏,而且还有大量的普通百姓融入基层社会。<sup>[3] 40-45</sup>归义军时期,吐蕃军事势力退出敦煌地区,但是大量的吐蕃移民来不及撤离,就留在敦煌。通颊和退浑部落就是用来安置吐谷浑、吐蕃和粟特等少数民族百姓。还有一些吐蕃移民的散户则被安置在诸乡,成为归义军政权管理下的编户,同敦煌其他居民一样服役纳税。

收稿日期:2011-09-22

作者简介:耿彬(1981-),男,河南南阳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西北民族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学。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大力发展佛教,同时也避过了“会昌灭法”对佛教的破坏,使佛教教团和寺院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吐蕃统治时期,共开凿了57个洞窟,从洞窟建筑形制、壁画流行题材、绘画样式风格、人物风情面貌等方面反映出其独具的时代特性。经变画的大量出现、吐蕃装的出现以及吐蕃装与汉装供养人画像同时并存于洞窟、僧人多于世俗人等现象都表明了吐蕃统治时期的艺术风格。<sup>[4] 28-30</sup>

以上两点说明中晚唐五代时,敦煌地区存在大量的吐蕃民族,并通过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给敦煌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二、中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吐蕃民族与汉族文化之融通

1. 围棋。围棋在吐蕃广为流传。《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云“围棋陆博,吹蠡鸣鼓为戏,弓剑不离身。”<sup>[5] 5220</sup>《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上《吐蕃传》云“其戏,棋、六博。其乐,吹螺、击鼓。”<sup>[6] 6073</sup>围棋在我国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代,经秦、汉、两晋南北朝的不断发展,广泛传播于民间。在敦煌地区,早在南北朝时期就盛行围棋,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棋经》足以证明。《棋经》写于北周年间,全卷共八篇,现残留七篇半,共169行,约2500字,全文精辟地论证了下棋之道。<sup>[7] 61-64</sup>敦煌壁画中也存在关于围棋的画面。五代时榆林窟第31窟《维摩诘经变》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棋弈场面:二人在桌前对弈,维摩诘居士站在一旁,手拿羽扇观棋。莫高窟五代第61窟西壁佛传故事屏风画第21扇,绘有悉达太子弈棋图。此外,敦煌石窟的藻井、龕顶、窟顶等处绘有棋格雁衔瓔珞、棋格千佛、棋格团花等图案,如初唐第67、78、328窟,盛唐第23、25、27、38、46窟,中唐第7、92、112、154、222、359、360窟,晚唐第8、9、12、14、29、94、106、142窟,五代第6、22、35、99、100窟等。<sup>[8] 272</sup>《通典》卷六《食货六》云“敦煌郡(贡棋子二十具,石膏,今沙州)。”<sup>[9] 119</sup>《新唐书》卷四十云“沙州敦煌郡,下都督府。本瓜州,武德五年曰西沙州,贞观七年曰沙州。土贡:棋子、黄矾、石膏。”又据《唐地志》记载“都四千六百九十,贡棋子。”《唐地志》是天宝初年的写本(742年),现存于敦煌博物馆。可知,敦煌在唐代不仅作为贡棋的主要产地盛产棋子之外,而且通过《棋经》及敦煌壁画中有关围棋的画面得知,古代围棋在敦煌民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上至行政官吏、敦煌大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喜爱围棋。同时,史籍记载围棋也是吐蕃民族一种古老而传统的文化活动。吐蕃占领敦煌的六七十年间(781~848年),围棋也必然会作为吐蕃民族日常的一种娱乐活动,成为吐蕃民族与其他各民族之间交流的一种手段。

2. 狩猎与马球。吐蕃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其军队主要由骑兵构成,因此他们对马的重视尤为突出。在长期的养马、育马过程中,不仅培育了优良的马种,而且掌握了高超的骑术。敦煌吐蕃残卷《医马经》、《训马经》体现出吐蕃人畜牧业发展的高度,特别是马的繁育和使用达到相当水平,且吐蕃的兽医学已发展成为藏医学的分支。敦煌文书P.1062《敦煌古藏文医马经》残卷记载:“骑马打猎或……奔跑间连人带马摔倒于鞍下治疗之方:若不能站立,偏倚而卧,……秋季喂六七天青草后于尾根炙之即愈。”<sup>[10] 84-93</sup>狩猎是吐蕃民族的经常性的活动,从长期的狩猎过程中,总结了医马的方法。敦煌壁画中也存在诸多狩猎图,如莫高窟唐代第321窟主室南壁的狩猎图、莫高窟唐代第130窟东壁北侧的射箭图、莫高窟唐代第358窟南壁西侧的猎兔图、莫高窟唐代第18窟西壁的骑射图、莫高窟唐代第85窟窟顶东坡的狩猎出行图、莫高窟唐代第156窟东壁南侧下部的射鹿图、莫高窟五代第61窟屏后背的狩猎图等,说明当时狩猎是敦煌地区一种很普及的活动。汉文史籍中记载了吐蕃人打马球风气之盛及其高超的马球技艺,马球也成为了吐蕃与中原王朝的一种交流方式。《封氏闻见记》卷六《打球》云“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曾一度观之。昨昇仙楼有群胡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胡疑朕爱此,驰为之。’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成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好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满赞咄犹此仆射也。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献诗。”<sup>[11] 53</sup>《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云“景龙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赞吐等来迎女,中宗宴之于苑内球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球,中宗率侍臣观之。”<sup>[5] 5226</sup>古代敦煌是河西政权控制西域的重镇,马球在敦煌地

区也得到广泛开展,并作为提高军事作战能力的一种手段。敦煌文书中记载了很多有关马球的场景。敦煌文书 P. 2544《诗文集(5—3)》记载了一场生动的马球比赛:“……传中手持白玉鞭,都史乘骑紫骝马。青一队,红一队,珂皆铃笼得人爱。前回断当不盈输,此度若输后须赛。脱绯紫,着锦衣,银鍱金鞍耀日辉。场里尘非(飞)马后去,空中球势杖前飞。求(球)四(似)星,仗(杖)如月,骤马随风真(直)充(冲)穴。人衣湿,马汗流。传声相问且须休。或为马乏人力尽,还须连夜结残筹。”<sup>[12] 256</sup>敦煌文书中还记载了归义军统治时期与马球有关的场景,P. 2568《南阳张延绶别传》云“又善击球,邠帅莫敌。”<sup>[13] 27</sup>说明马球也流行于归义军高级将领中。另外,敦煌文书中还有许多关于球场的描绘,马球也作为归义军统治时期重要的军事训练内容,敦煌研究院藏《酒帐》中有“十九日,寒食坐设酒三瓮,支十乡里正纳球场酒半瓮。”S. 1366《使衙油面破历》记载“二十一日,准旧十乡里正纳球场胡饼四十二枚。”<sup>[14] 277, 3239</sup>《归义军节度兵马后留使牒》记载“领步卒叶到球场,列陈排军,更宜尽忠而效节。”<sup>[15] 269</sup>

综上所述,随着唐初对西域的经营,丝绸之路重新开通,东西方文化交流也进入空前繁荣时期。吐蕃本身作为游牧民族,擅长于骑射,马球技艺也非常优秀,并能与唐朝好手在球场见证球技。马球在唐代敦煌地区广泛流行,唐代晚期归义军统治敦煌时期,马球并没有因为吐蕃统治敦煌的六七十年而消失,仍然盛行于敦煌民间及军队中。因此可知,在吐蕃占领敦煌期间,马球也是吐蕃民族进行娱乐、军事训练的项目。另外,又知吐蕃移民在归义军时期逐渐汉化,其中部分人在曹氏归义军时期成为归义军政权的高级将领和地方官员<sup>[3] 40-45</sup>,他们也在军事训练过程中利用马球运动提高作战能力,在平常节日或重大活动中把马球作为娱乐手段。

3. 相扑。汉文史籍曾记载了吐蕃等西域少数民族擅长相扑,且不乏有高手前往中原,并描述了相扑比赛的场景。《续高僧传》云“有西蕃贡一人云大壮,在北门外试相扑,无敌者。帝恧之,云‘大隋国无有健者?’召通亲,令相扑。《唐语林》云‘李相绅督大梁日,闻镇海军进健卒四人,一曰富仓龙,二曰沈万石,三曰冯五千,四曰钱子涛,悉能拔橛角觚之戏……万石等三人,视炙坚粗,莫敢就食,独五千瞋目张口,两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真壮士也,可以扑杀西域健胡。’”<sup>[16] 337-338</sup>敦煌文书及敦煌壁画中也有很多有关相扑的记载,说明相扑运动作为一种用来欣赏和娱乐的乐舞表演或者一种竞技运动曾盛行于敦煌地区。俄藏敦煌文献 Дх 02822《蒙学字书》载“音乐部第九:龙笛、风管、秦筝、琵琶、弦管……相扑、曲破……”<sup>[17] 62</sup>本则内容可以看出相扑属于乐属性质的表演活动。S. 1366 载“准旧相扑汉儿面五斗。”<sup>[14] 278</sup>说明相扑作为民间赛神活动的一个项目,得到了归义军政权的支持。敦煌壁画中所出现的相扑画面有:莫高窟唐代第 9 窟主室南壁的摔跤图、莫高窟唐代第 14 窟主室南壁的相扑图、莫高窟唐代第 85 窟窟顶南披的相扑图、榆林窟五代第 36 窟南壁的相扑图……。可知,中晚唐五代时期,相扑与民间的赛社活动融合在一起,大大促进了相扑的发展,而且牵动官府与寺院僧人。吐蕃民族作为敦煌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上至高官将领,下至平民百姓,必然与相扑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 百戏。汉文史籍中记载百戏由中原传入吐蕃,随之在吐蕃也广为流行。《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吐蕃传》云“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sup>[6] 6081</sup>《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吐蕃传》记载唐朝使者刘元鼎出使吐蕃的场景“唐使者始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云“长安二年,赞普率众万余人寇悉州,都督陈大慈与贼凡四战,皆破之,斩首千余级。于是吐蕃遣使论弥萨等入朝请求和,则天宴之于麟德殿,奏百戏于殿庭。”<sup>[5] 5226</sup>可知,中原的百戏对吐蕃影响之深。敦煌壁画中有诸多关于百戏的画面,如:莫高窟五代第 61 窟西壁的角抵图、莫高窟唐代第 361 窟南壁东侧的撞技图、莫高窟唐代第 9 窟西壁的撞技图、莫高窟唐代第 85 窟窟顶东披的撞技图、莫高窟唐代第 156 窟窟顶东披及北壁下部的撞技图、莫高窟五代第 61 窟南壁的撞技图、莫高窟唐代第 220 窟南壁的倒立图、莫高窟唐代第 79 窟窟顶北披的倒立图……。敦煌曾被吐蕃统治将近七十年,至归义军统治时期仍有大量吐蕃移民存在,当地百戏技艺必然会与吐蕃的百戏技艺进行交流融合。

### 三、结论与启示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各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也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自从唐代安史之

乱之后,吐蕃占领敦煌,到随后的张氏归义军、曹氏归义军统治时期,吐蕃都是除了汉族居民之外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再者,敦煌地区以外,河西地区还有高度独立的吐蕃移民部落,吐蕃势力并未完全退出河西走廊。<sup>[3] 40-45</sup>说明敦煌地区吐蕃与汉族之间的文化必然在长期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历史过程中相互融合,这种融合是在保留其主体精神基础上的双向“扬弃”过程,会给各民族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对各族文化兼容并蓄、胸怀广大的包容气魄,这也正是中华古代文化辉煌灿烂的内在原因。我们研究中晚唐五代吐蕃与汉族民族文化的融通,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历史融合过程中藏汉民族在宗教和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藏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心理认同的理解,对于抵制和反对民族分裂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sup>[18]11</sup>同时,我们也能充分认识到:在当今世界格局下,各民族文化将超越民族和地方的局限性,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交流和对话,既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又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各民族文化在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关系中共存共荣,从而促进经济与政治全球一体化的进程。<sup>[19]163</sup>

#### 参考文献:

- [1]李树亮.敦煌写卷古籍序初探[J].求索,2010(7).
- [2]英藏敦煌文献:第九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 [3]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初探[J].中国藏学,2005(2).
- [4]万学汇.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时代特性[J].中国藏学,2007(1).
- [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第一百九十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6][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二百一十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英藏敦煌文献:第八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 [8]李金梅,李重申.丝绸之路体育图录[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
- [9]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0]王尧、陈践.敦煌吐蕃写卷《医马经》、《驯马经》残卷译释[J].西藏研究,1986.
- [11]封氏闻见记校注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2]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十五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3]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十六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4]英藏敦煌文献:第二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 [15]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二十二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6][宋]王说撰.唐语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7]俄藏敦煌文献:第十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18]王智汪.论民族意义上的藏文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
- [19]赵晓鹏.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全球化与民族文化[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3).

(责任编辑 余 目)